

新文化偶像的塑造： 胡适及其受众

张仲民

摘要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五四”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暴得大名”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动”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胡适 偶像 受众

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2-0158-16

近年来，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颇多高质量的著述，为我们更行深入和全面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从视角或方法论角度看，很多有创获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视野，这也告诉我们从此角度重新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关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过程及受众的反应情况则是传播学和阅读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本文即拟从此角度来考察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其受众之间的互动情况，尤其是受众的具体反应样态。

庆幸的是，赖以进行此研究的材料支持非常之多。胡适有意无意保留下的丰富个人资料，特别是其日记和往来书信等非常细节性的记录，以及他同时代人留下的旁证，再加上当时各报刊诸多的胡适报道，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为我们这个考察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保障与关联视角，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具批判性地检视这些资料中呈现出的胡适为人及其与周边互动的情况，尽可能避免割裂语境就胡适论胡适。

职是之故，本研究希望讨论胡适成为新文化偶像背后的部分内外因素和社会条件，知世论人，借以丰富我们对胡适为人及其形象塑造过程的认知，进而加深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之“互动”和“运动”层面的理解。

一、“五四”的刺激

从受众的角度看，《新青年》及《新潮》和《每周评论》诸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得到许多知识精英的认可，其销路“均渐畅旺”，^①但能够读过《新青年》或读过更为晚出的《新潮》和《每周评论》这些杂志的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依然不多，即便是读到它们的人中，多像舒新城那样是无意识的：

自民国五年起我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即陈独秀，引者注）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②

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新青年》等新书报才逐渐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正如钟敬文回忆“五四”对其“旧式士人的候补者”生活的影响时之言：

“五四”的轰雷惊醒了我的梦。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新青年》这种刊物，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五四”运动开始以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它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心爱读物，我千方百计要弄到它。一卷到手，每每由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一点不让遗漏。后来胃口更大了，订购《小说月报》，爱看《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新诗，尤感兴味。^③

类似钟敬文，舒新城也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予他“以重大的影响”：“自‘五四运动’以后，求知欲更为发展，各种刊物风起云涌，使我应接不暇，竟因读书过度而生胃病。我的教育学术研究及著作生活，也在此时植立较深的基础。”^④为此他订阅了一年达九十多元的新思潮刊物——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那时的我，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而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的附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杜威的讲演尤看得仔细。同时写文章也由文言而改为语体。^⑤

时人宫廷璋也曾谈起五四运动之于湖南人接受新思潮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之酝酿，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等赞许，而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⑥

可以说，正因为“五四”运动的刺激，《新青年》销量较之初创刊时的一千份猛增，但据杜威的描述，仍不过五千份，距此后汪原放所说巅峰时期的一万五六千份尚差距不小。^⑦同样《新潮》杂志的印量在1919年初时也才为一千册，尚无法确定可以销完。^⑧当然销售数量并非评价书刊影响大小的唯一或最好标准，但从中至少可以管窥“五四运动”对于各种新思潮刊物销量的提升作用，^⑨乃至由此产生的对于年轻人的启蒙效果。正如“五四”当事人罗家伦的判断，“五四这个大刺激”，让时人“不能不受影响”：

① 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23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页。

②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该自述实即舒新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回忆录《我和教育》一书。

③ 钟敬文：《“五四”——我的启蒙老师》，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④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132页。

⑤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137页。

⑥ 宫廷璋：《湖南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原载1925年9月《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转见李永春编：《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第1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⑦ 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⑧ 参见顾颉刚1919年1月14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7年，第66页。

⑨ 据时人言，五四运动后，几乎每份新思潮刊物，其销量大多在千份以上，“我国自去年来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一日千里，各种杂志周刊，出者日多，购者亦日众。差不多无论何种新杂志，他的销路，总在千份以上”。颍水：《文化运动与辞典》，《时事新报》1920年5月20日，第4张第2版。

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①

新文化运动时也正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也回忆说：

这次爱国运动激起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扩大其影响于全国，促使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个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启发。^②

在另外一当事人常乃德看来，“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的影响只是局限于一少部分精英人士，社会上大部分人对此并无感觉，但“五四”运动之后就形势大变：

全国的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层见叠出，全国的小刊物，用白话撰成的小刊物，风起云涌，普及于各地……新文化运动已经不是仅仅咬文嚼字的书生运动了，他成了一种潮流，一种猛烈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这是谁的功劳，是五四运动的功劳。^③

因此常乃德判断说，是“五四”运动催熟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只在酝酿，尚未成熟……直到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起后，春雷一声，才将新文化运动从摇篮中扶养成熟起来。”^④舒新城也认为是“五四”运动的结果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名词”：

在外交上虽未成功，但思想的解放运动，则由此而爆发。一般青年惊醒之后，对于以往的种种，都要重新估价，而知识的钻研更成为一般的要求了。于是由政治运动发端，而逐渐蔚为“新文化运动”。^⑤

同样是认识到“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孙中山从争取青年认同、扩大本党影响和同商务印书馆进行竞争的角度则指示国民党积极介入新文化运动，利用报章杂志与印刷所的力量进行鼓吹宣传：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⑥

较之于孙中山以政治实用性的眼光看待五四运动，胡适本人则认为“五四”运动促成了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也让人们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⑦

1928年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纪念五四的演讲中，胡适又更为具体地表示“五四”运动“间接方面的影响很多”：

一、引起学生界注意政事；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白话文因之通行起来；三、提倡平民教育运动；四、提倡劳工运动；五、提倡妇女运动；六、政党信用学生，许多机关报的副刊都请学生去担任，于是新文化的思潮渐渐高涨起来。孙中山先生也开始注意到思想的革命的重要。^⑧

① 参见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第848页。

②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7页。

③ 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第185页。

④ 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第184页。

⑤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135页。

⑥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210页。

⑦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⑧ 胡适1928年5月4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65页。

上述种种表达，均可见时人眼中“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实际上，如近来论者所指出的：即便是“新文化运动”一词之流行，也是缘于“五四”运动的刺激，此后“自五四运动以来”之类句式更是成为时人的一种习惯性表达。^①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刺激了《新青年》等杂志在全国各地销量的增加，也放大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这等于追认和证明《新青年》之前所倡导的内容及其矫枉过正的言说方式之合理性与预见性，相当于承认与强化了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者的导师与领导者地位。像一位读者“铁民”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

自来谈新文化的人，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而阁下与陈君（独秀）之名，亦随借此发达。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故数年以来，报章上亦常常看见阁下赞美五四之事……^②

另外一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读者“李长义”所见略同。自谓“非迷信新文化”的他记录了章士钊于长沙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演讲——此演讲在长沙《大公报》连载，他在章文前加有按语评论道：“吾人平心而论，近两年来青年思想之猛进，实不能不归功于胡陈等之提倡新文化。”^③

吊诡的是，1920年9月17日，“暴得大名”后的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公开发言时，却拒绝承认自己过去从事的文化事业是“新文化运动”，“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拒绝别人恭维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原因是他认为“我们现在哪里有什么文化”，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的“我们北京大学”表现乏善可陈，没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外面学界虽然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但并没有真正动起来，“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现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新名词运动”，“我们北大”要感到“惭愧”，要“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求“高等学问”，“真提高”。^④胡适这里的演讲显然是对于当时人们滥用新文化运动的情形表示不满，同时也有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进行解释和回护之意，当然其中更有反躬自省与激励北大师生之意——也为其之后转向整理国故工作打下伏笔。但胡适此处的表达同样不无自我炒作、故作高论之嫌，欲擒故纵的他希望借此机会委婉向同人展示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受到的推崇情形，这非常能体现胡适好名与聪明的一面，^⑤也显示其“炒作”技巧之熟练程度。其方式颇为类似1922年底他以“曲线救国”的做法介入在华英文媒体《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发起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讨论与评选中，结果胡适从最初没有列名候选，到最终得以位居正榜第十二位——列正榜前十二名者除列第六位的蔡元培、第十位的余日章外，其余皆是当时政界人物（孙中山、冯玉祥、王宠惠、吴佩孚、王正廷、张謇、阎锡山、黎元洪），得票数（613）远高于第十四位的梁启超（474）、第十七位的章太炎（328）、第二十四位的康有为（155）。^⑥

二、新偶像的塑造

洪宪帝制失败，特别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晚清延续下来的学术权威与思想领袖如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严复、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依然还在产生影响，但各人的情况差别很大。因为筹安会事件，加上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严复和刘师培几乎完全淡出思想界，康有为则因介入张勋复辟而名声大臭；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的林纾这时期翻译品质和创造力陷入颓唐境地，后继乏力；尚继续活跃的章太

① 参见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铁民：《致胡适（1922年2月17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41页。

③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1922年10月21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4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注释。

④ 胡适：《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7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6—70页。

⑤ 胡适当年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即已有“好名”之名，为此屡屡出头与学校当局较真。为此其二哥特意写信规劝他：“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信中并劝胡适：“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胡适丙午年四月廿五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7卷，第32页。

⑥ 有关情况可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篇，第270—279页。对此评选的研究还可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炎、梁启超均因涉入政治太深难以自拔，只有章士钊在民初以办《独立周报》和《甲寅》名声大噪，“学术文章皆有时誉”，^①他且打造出一种逻辑严密的章派文言文文体，^②但同样“未能忘情政治”^③。总言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章太炎与梁启超仍是声望最隆、影响最大的偶像，在时人看来，五四之前知识界“讲学问，章太炎先生居首位；讲文章，梁任公数第一”。^④无怪乎胡适后因为打算写作关于先秦诸子的博士论文，曾详细阅读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胡适认为“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他研究诸子学“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过胡适这里也认为章太炎的诸子学“亦未免有穿凿过当及支离破碎之处”，他本人“亦不敢盲从苟同”，胡适对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一文，尤其贬低，“乃其诸子学幼稚时代之作，最多可笑之处”。^⑤之后胡适并希望好友许怡荪帮其代购章太炎弟子康宝忠兄弟新出版的《章氏丛书》寄美，以供其写作博士论文之用。^⑥胡适收到寄书后“细细圈读之，虽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⑦为其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与章太炎商榷做了铺垫^⑧。然而当胡适接受陈独秀推荐和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后，拥有所谓留美“博士”头衔光环的胡适又发现太炎及太炎门生在教育界势力非常之大，为了站稳脚跟，胡适不得已继续用功苦读太炎著作，与北大的太炎门生交好同时，也主动向章太炎本人示好。^⑨

胡适在北大逐渐获得众人认可的过程中，校长蔡元培对胡适出身的“误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撰序言中，蔡元培误会胡适为所谓汉学“世传”正统“绩溪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之后，不但治西洋哲学、文学，又能兼治汉学，“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⑩不管这个误会是来自胡适的暗示，或是出自蔡元培有意的相助，这个绩溪汉学世家之后的误读流传很广。而胡适此书 1919 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迅速走红，广受读者欢迎，“谈者谓《哲学史》一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⑪稍后面对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质疑之时，蔡元培再次表示胡适“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⑫应该是受到蔡元培此说的影响，其后吴虞、金毓黻、章士钊、梁启超（详后）等人均对胡适出身有此误会。远在成都的吴虞视胡适为

① 吴虞 1914 年 6 月 21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4 页。初入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得知文科聘请的教师名单中有教逻辑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后，即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是中尤以章行严先生最为倾心瞻望，非震其名也，闻上课而外尚有特别研究。”参见顾颉刚：《致叶圣陶（1917 年 12 月 17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2—23 页。

② 胡适 1919 年在接受采访时曾高度评价章士钊一派的文章风格及影响，视其为梁启超新民体的接续者：“章行严做‘文言的文章’的本领，实在不小，因为他的文章，能达极繁密的思想，能把思想一层一层的剥进……因为有了章派的文体，很能达极繁密的思想。”但胡适这里表扬章士钊的意图在于为接下来自己倡导白话文运动做铺垫，“因为章派的文章不是人人能做的。就是能做的人，做一篇文章，也要费很大的气力。再就看的人方面讲，要看得很明白，也不容易。有了这两种困难，所以章派的文章，还是不适用。章派的文章，既不适用，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倡白话文学了。”真心：《关于新文学的两个问答》，长沙《大公报》1920 年 1 月 16 日，第 7 版。

③ 参见顾颉刚：《致叶圣陶（1917 年 12 月 17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第 28 页。

④ 参见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 491 页。

⑤ 以上引文皆见《胡适致许怡荪函（39）（1916 年 1 月 25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5 页。

⑥ 《胡适致许怡荪函（40）（1916 年 4 月 7 日）》、《许怡荪致胡适函（21）（1916 年 5 月 17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 58、139 页。胡适之前在日记中也认为《诸子学略说》一文“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 1914 年 9 月 11 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511 页。较之胡适，深受家庭苦趣而反孔的吴虞稍早时读到章太炎此文却非常佩服，“攻孔子处尤佳”，后来吴虞甚至将此文翻刻五百份发卖。参见吴虞日记 1912 年 1 月 7 日、2 月 12 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第 23、28 页。

⑦ 《胡适致许怡荪函（44）（1916 年 7 月 17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 64 页。

⑧ 参见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244—251 页。

⑨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年，第 525—547 页。

⑩ 参见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1918 年 8 月 3 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8 页。

⑪ 熊克武：《致胡适（1919 年 9 月 10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71 页。

⑫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 年 3 月 18 日）》，《蔡元培全集》第 3 卷，第 271 页。

标杆，赞其“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①此时为胡适热心读者的金毓黻读到胡适新发表的《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一文后^②，认为“胡氏承其家学，颇右汉而左宋”^③。章士钊则说系统绩溪三胡之后的胡适有“家传旧学”，其新学水准，“实远在其中国知识之下，现在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他所长。”^④在当时一般舆论那里，具有美国哲学大家杜威门徒身份的留美博士胡适其新学水准自是一流，^⑤如果其新学尚不如其旧学水准之高，那胡适旧学底蕴之深就可想而知了。时人这些对胡适出身的误会，对于胡适当时的处境及之后的形象塑造助力颇大，而实际是理学家出身的胡适对时人这个误会“并不否认，而且坦然地接受”，以致于周予同等人多年以后还以此作为证据来讨论胡适思想同乾嘉汉学的关系。^⑥

此外，北大校内同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胡适的帮衬也有助于胡适的崛起。他们对新来乍到的胡适揶揄有加，为其呐喊助阵，不以其资浅年轻而有所轻视，其中“我的朋友钱玄同”尤其成为胡适经常援引的佐助凭借和对话对象。为了扩大影响、吸引读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发言时，“各领袖的言论很有过当之处”，像刘半农和钱玄同不惜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唱双簧宣传白话文、故意人身攻击林纾和古文，稍后鲁迅挖苦林纾和刘师培口气更是出格与激烈。各人这样有失偏颇的发言方式，自然是因“为鼓吹宣传的缘由而张大其辞”，^⑦在实际效果上虽然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力，但也为之招致一些反对的声音（不纯是来自旧派），不过由此却很好地反衬了胡适的温和理性形象，因为胡适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哪怕自己坚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⑧“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⑨在实际行动中，即便林纾批评白话文及新思潮，胡适在教学中也选取了林纾文章作为教本，不以偏狭自限。^⑩两相比较，胡适这样的表态与作为自然更容易获得同情。^⑪如一个留日学生张黄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此地的留学生都格外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纯粹是学者的态度，不像钱先生（指钱玄同，引者注）他们常常怒骂。”^⑫

流风所及，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受到影响，直接以温和的白话文形式致信胡适，同其讨论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诸子学（即前引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内容。^⑬这样以白话文的方式给晚辈写信讨论对方的著作，此一动作对章太炎来说非常罕见，其本身极具有象征意义，不但显示着章太炎学随时进和从众的一面，也意味着章太炎这样固执自负的前辈学者已经无法忽视青年胡适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识趣的胡适自然意识到章太炎这次示好之举意义，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1919年5月

① 参见吴虞 1919 年 8 月 20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480 页。

② 胡适该文后来被收入《胡适文存》，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363—390 页。

③ 参见金毓黻 1920 年 12 月 2 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1 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第 166 页。

④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1922 年 10 月 21 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4 册，第 155 页。

⑤ 据舒新城回忆说，从清末教育界开始，中国社会对欧美留学生的尊重程度已经超过留日学生，“所谓西洋一品、东洋二品、中国三品。”参见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 82 页。

⑥ 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44 页。

⑦ 于鹤年：《致胡适（19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67 页。

⑧ 胡适：《答汪懋祖（1918 年 7 月 15 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02 页。

⑨ 胡适：《致钱玄同（约 1919 年 7-8 月间）》，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38 页。

⑩ 参见金毓黻 1920 年 11 月 15 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1 册，第 155 页。

⑪ 胡适这种做法当时即遭到好友钱玄同的反对，钱玄同曾直接致信胡适表达他对胡适这种折中调和立场的不满：“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致胡适（1919 年 2 月）》，《钱玄同文集》第 6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4 页。钱氏此信系年有误，当系钱玄同 1918 年 9—10 月间写给胡适的，胡适对钱玄同的这个批评并不认可。关于胡适对此信的答复，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18 年夏）》，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25—226 页。

⑫ 张黄：《致胡适（1919 年 5 月 2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49 页。

⑬ 《章太炎与胡适函（1919 年 3 月 27 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859 页。关于胡适与章太炎关系，可参见赵家铭：《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唐德刚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长沙：岳麓书社，2015 年，第 191—199 页。

2日)中特意对此加以致敬:“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逸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①

“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又有了来华讲学的老师杜威助阵,^②更加受到舆论关注和青年崇拜。万众瞩目之下,“暴得大名”而自身形象又上佳的胡适自然化身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金字招牌”,不但成为打算攀附新思潮的商务印书馆重金拉拢的对象,更是诸多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像舒新城虽然很早就订阅了《青年杂志》(《新青年》),还曾在其上发表过通信,得到过陈独秀的热情回应。^③饶是如此,他当时对在该杂志上也发表文章的胡适了解不多,直到“近来”(应该就是在五四后)才知道胡适是“思想界的一个明星”,如他于1919年10月29日写给胡适的仰慕信中的表达:

年前我在《新青年》上看见先生的文章,我就羡慕异常,以为西洋留学生能肯在中国旧文化上去研究革新的方法,将来效果一定是很大。当那个时候,我虽然羡慕先生,但还不知先生是甚么人。近来在各杂志上时常读先生的文章,才晓得先生是思想界的一个明星。我这话不是恭维先生,因为以今日文学界、思想界革新的成绩来推论及于先生的。^④

与舒新城一样,身在长沙的《新青年》读者毛泽东同样是胡适的仰慕者之一,他在积极从事湖南本地的新文化运动之余,也接受过胡适的指导,而胡适对毛泽东的表现也非常看重,双方之间有过不少的互动。^⑤这时候的毛泽东与胡适无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至少到192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反对统一》的文章中尚引用了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⑥双方的分道扬镳只是后来之事。上述胡适与包括舒新城、毛泽东这样的在地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情况正可印证《努力》周报的读者徐望之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的情况:

先生的思想是很博杂的,所以先生的事业亦是多门的,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⑦

胡适这样万众风靡的景象难怪会让不喜欢白话文和新诗的昔日偶像章士钊产生不满情绪。“五四”运动后不久,章士钊即开始连续批评《新青年》与新思潮,倡导调和论,主张保存旧文化与旧道德,后来更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但在1920年11月24日,章士钊还是如章太炎一样主动用白话文的形式致信胡适讨论学术问题。^⑧不过,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章士钊就公开向胡适发出了挑战。

1923年8月下旬(21—22日),章士钊在杭州暑期学校的演讲中,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正在杭州养病兼度假的胡适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形象的讽刺:“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⑨章士钊这样的表达与其说

① 参见胡适:《再版自序》,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5卷,第196页。

②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暗批胡适不懂西洋学术精华,只知拿杜威学说来招摇,所输入中国者为被西洋视为糟粕之文化,“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学问殊未深究,但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既不免舛误迷离,而尤不足当新之名也”。实际上,据江勇振教授的研究,杜威访华前,胡适对杜威学说所知非常有限,只是选择性利用,还有许多误解,其博士论文中更有一些与杜威观点相抵触的内容。胡适真正对杜威思想熟悉则是在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访问后,为了要陪同其演讲做翻译工作,胡适才好好阅读熟悉了杜威著作,但因其之前经常拿杜威充门面,以杜威真传弟子自居,才使得包括吴宓在内的时人与后人误会,化约了胡适思想与杜威关系的复杂性。参见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该文原刊1921年春季号《留美学生季报》,节录于《学衡》1922年第4期,引文在第4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76—348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篇,第115—189页。

③ 《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5—6页。

④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册,第261页。

⑤ 参见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0—155页。

⑥ 参见毛泽东:《反对同意(1920年10月1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部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33页。

⑦ 徐望之:《致胡适(1922年8月15日)》,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61页。

⑧ 参见章士钊:《致胡适函(1920年11月24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4册,第135页。

⑨ 章士钊(行严):《评新文化运动》,原连载于:《新闻报》1923年8月21日,第1张第3版;《新闻报》8月22日,第1张第4版;引文在8月21日号。该文又见《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1925年9月12日),第4—11页,引文在第7页。该文也被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4册,第210—218页。参见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2卷,第73—78页。

是对胡适的批评，不如说是对胡适当下地位的高度认可，某处程度上还意味着章士钊在借胡适进行自我炒作。此事一定程度上还表明“善假于物”且能左右逢源的胡适此时业已取代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成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最大明星，这种情况突出体现于“五四”后胡适与其受众的互动过程中，以下选取数个案例分别叙述。

三、胡适和梁启超

“五四”运动后，胡适言论很快被时人视为风向标，臧否之间，分别巨大。因之，胡适主动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推介表扬采用白话文体的国民党系杂志《星期评论》后，^①让主持该杂志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颇感受宠若惊，他立刻致信胡适表示：“实在感谢的极，但是因为先生这一表扬，我们以后更非十分努力不可。”^②国民党各要员和孙中山方面也趁此机会主动向胡适示好，其中受孙中山委托的廖仲恺更是致函胡适请其批评孙中山的新作《孙文学说》：“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③当胡适在《每周评论》对《孙文学说》进行评论并对其“大旨”做出阐发和认可后，^④廖仲恺又代表孙中山写信给胡适表示感谢，并请胡适为国民党主办的《建设》杂志写稿或代为介绍书商代理销售该刊：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请先生不要客气。《建设》已出版，另外封寄先生一本。要是有空的时候，很希望赏光寄篇大文。（能介绍一家书铺或是别的地方代理这《建设》杂志，最妙。）^⑤

为了借助胡适的影响，稍后戴季陶和沈定一再度致信胡适，要其“无论如何，给我们《星期评论》纪念号做一万字来，不但读《星期评论》的欢迎，就是办《星期评论》的也非常感激。并且要求你在本月卅号前寄到上海。”^⑥胡适遂应约寄送了《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篇长文。^⑦廖仲恺读到该文后也马上致函胡适，继续为《建设》索稿，希望其能够履行之前答应给《建设》赐稿的承诺：

后在《星期评论》的国庆纪念号上，见先生整万字的文章，更相信先生肯替《星期评论》增这么大的光采，断不会让《建设》杂志辜负这两个月来的希望，而使季陶受我们的妒忌的。若是有了稿子，请先生赶紧寄来，否则也请先生有工夫的时候，回我几个字，说甚么时候可有稿子，我们立刻就登预告……^⑧

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的低调固然同其暂时在野的位置和希望拉拢胡适及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有关，^⑨但这又何尝不是因为胡适的风头太盛、影响太大所致？这跟稍后国民党方面在1929—1930年言论围剿胡适，乃至胡适写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进行回应的情况不啻有天壤之别。^⑩

当然，这时胡适之所以主动发文先后揄扬采用白话文的国民党人主持的《星期评论》和《建设》杂

① 参见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1919年6月29日，第1—2版。该文被收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第176—181页。

② 戴传贤：《致胡适（1919年7月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2页。

③ 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5月23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页。

④ 参见胡适：《评〈孙文学说〉》，《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版。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第187—190页。

⑤ 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8月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67页。

⑥ 戴传贤、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9月2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67页。

⑦ 《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第5张，第1—4页。胡适该文被收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158—178页。

⑧ 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10月20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4页。

⑨ 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可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24—361页。

⑩ 有关这一时期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其演变情况，可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下篇，第374—400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为学论政（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第53—84、117—198页。

志，接着又应邀为其撰稿，后又为《民国日报》撰文，与国民党方面暂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很难说其背后没有援引同盟对抗“敌人”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意识在。如据当时邓家彦致胡适的信中所揭示的，之前因为天津《益世报》不愿意为杜威演讲发布义务广告，护师心切的胡适遂致信责备为该报工作的国民党党员邓家彦，武断目其为“党见太深”的研究系，认为这是研究系在杯葛杜威演讲，胡适此信中体现出的不冷静和误会会让邓家彦非常不满，他反唇相讥胡适才是受研究系所托“致其攻击”，其“党见更厉害”，故才“平白地迁怒”于邓，“哲学家头脑不应简单如此”。^①经由邓家彦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胡适这种对梁启超及其研究系警惕心态的紧张程度！时至 1921 年，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的草稿中仍视正与之竞争的梁启超研究系为“敌人”，严厉责备陈独秀不该自乱阵脚，相信传言致与《新青年》同仁陶孟和产生矛盾：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世界丛书》是胡适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一套译介新学的丛书，引者注），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指张东荪将《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引者注）？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指梁启超，引者注）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②

透过信中一系列“你难道不知”的反问及“我们”的表达，与此前对邓家彦的怀疑一样，自认为被针对的胡适急于拉同盟的气急败坏心理和他对梁启超研究系的不满情绪跃然纸上。江勇振教授视胡适该信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③可谓的论。之后胡适联合蔡元培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时，更是刻意排斥正在拉拢自己的梁启超及其研究系人马介入此事，仅请与自己私交甚笃的梁系大将丁文江加入，这让梁启超、林长民等人非常不满，梁启超甚至表示“我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暗示自己一个人的资格与影响即不下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联合。梁启超的这种自负心理大概又深深刺激了胡适，在当日日记中，胡适嘲笑梁启超希望用“公民复决”方法解决当前政治困局的提议，讽刺之前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赴湖南演讲归来的梁启超只配将此提议写进正倡导联省自治的赵恒惕打算制定的《湖南宪法》中。^④胡适对梁启超这种既警惕又鄙视的心理后来还有所体现。据陈衡哲之后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所述，陈在著作中引用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关于文化的定义，胡适读后即致函陈衡哲批评这个引用，说陈衡哲上了梁启超的“当”，因为梁启超这个定义“荒谬”极了，胡适这里并告诉陈衡哲他有专门驳斥梁启超的演讲。^⑤凡此细节，均可管窥胡适所感受到的梁启超的压力，以及他欲超越梁启超的迫切心情。

较之胡适对于梁启超的竞争心态，梁启超对胡适的追随及由此产生的争议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从 1918 年 12 月开始首途，到 1920 年 3 月欧游一年多后回到国内，初回国的梁启超发现形势大变，昔日向自己执礼甚恭的少年胡适此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标杆，他所倡导的白话文正在风行。见机行事的梁启超迅速加入其中，“颇能努力跟一般少年人向前跑”。^⑥最明显的表现是梁启超用白话文的形式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讲述他旅行欧洲一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感，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如此，梁启超稍后在新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还吸收了胡适意见，并于书中称胡适为“绩溪三胡之后”，汉学世家出

① 邓家彦：《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79 页。

② 胡适：《致陈独秀（稿）》，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87—288 页。

③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上篇，第 208 页。

④ 参见胡适 1922 年 5 月 14 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624 页；《我们的政治主张》，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422—426 页。有意思的是，1923 年 6 月底，赵恒惕也曾发电邀请并加派专人到杭州迎接正在此处度假的胡适去长沙演讲，胡适以病婉辞（确实是无法赴约）。参见胡适：《山中杂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98—99 页。

⑤ 参见陈衡哲：《致胡适（1924 年 4 月 1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244—245 页。

⑥ 有关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和影响，可参见周月峰：《另外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诸人的文化努力与五四思想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5 期（2019 年 9 月），第 49—89 页。

身，“有正统派遗风”，进而还请胡适为自己《墨经校释》写序。^①另外，梁启超还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于1922年3月4日在北京大学做公开的评论讲演，赞扬胡适长处之外，梁启超也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胡适则当场进行了辩驳。^②

梁启超这样的表现，等于是帮助胡适鼓吹，同时无形中也表明自己在论学和思想上的确有追随所谓“绩溪诸胡之后”的胡适之势，无怪乎这会被章士钊讽刺为他在“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③而对胡适学行有偏见的湖南学者李肖聃则忍不住致信梁启超斥责其作为：

绩溪胡适，浪得时名。但有小人之才，未闻君子之道……巧言所布，举国若狂。先生年辈在先，胜流所仰，群望主持正论，觉彼童昏。先生乃低首少年，降心僮子。赞杜陵为情圣，排儒家为媚君。粤皖二人，沆瀣一气，迎合浮薄，丧其平生。竟无孟氏诂谏之心，韩公原道之志，何以慰天下之望，绝诡妄之风？^④

李肖聃后来又引章士钊的挖苦继续批评梁启超：“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谰闻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⑤李肖聃这里的批评不为不激烈，但其论何尝不是在宣示胡适及其所代表的白话文和新思潮力量之大，居然连领导思想界二十余年的大佬梁启超也主动附和乃至与之竞争，胡适“暴得大名”以后的风头也就可想而知了^⑥。

较之章士钊等人对梁启超追随胡适的批评，身处东北的老北大毕业生金毓黻（1913—1916在读）则对梁启超用白话文撰写《欧游心影录》之举充分进行了肯定，认为梁启超“用语体文作游记，可谓别开生面，造语隽永，富于趣味，盖以说部体出之者也。其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读之所以有味”。进而，金毓黻这里还将梁启超与胡适进行了对比，认为梁不如胡：

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其大别，则梁氏于政治外尚乏他科专门学识耳，即此一节，乃梁不如胡处。^⑦

四、胡适与章士钊

类似的经营意识与竞胜心态亦见之于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章士钊的关系中。向持“营业主义”的商务印书馆一直紧跟现实形势，^⑧且非常关注思想界动态，注意挖掘新出现的政学界人才为其服务。如1917年10月26日张元济致信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邀请章氏为商务译东文书，“每千字二三十元，发行可由我担任一切。”^⑨张元济给予章士钊的这个稿费待遇极高，可能仅次于当时中华书局给予梁启超的“千字三十元”待遇。^⑩稍后（12月3日），章士钊到访商务，“请以其所著文字由本馆印行”，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其版税按照书定价的十分之一支付。^⑪此待遇在商务所能开出的最优等之列，由此不

① 参见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第156—170页。关于梁启超和胡适的关系，可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唐德刚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第114—152页；夏晓虹：《政治与学术：阅读梁启超》，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35—229页。

② 参见胡适1922年3月5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529—531页。

③ 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1925年8月1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86页。

④ 李肖聃：《与梁任公书》，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65页。

⑤ 李肖聃：《星庐笔记·自序》，《李肖聃集》，第489页。

⑥ 顾颉刚日后回忆1920年代后北大校内的浙系（留学日法德派）与皖系（留学英美派）之争时，曾分析其原因即：“五四运动后，胡适以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参见顾颉刚日记1973年7月11日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836页。

⑦ 参见金毓黻1920年11月24日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160页。

⑧ 像顾颉刚一直对商务印书馆不重视学问的急功近利主义做法非常不满，且曾一度产生“恶感”，居然致信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抱怨“商务印书馆是充满着商业气味，与学问格不相入”。顾颉刚：《致朱经农（1923年6月3日）》，《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34—135页。

⑨ 参见张元济1917年10月26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1页。

⑩ 据吴虞记载潘力山语，中华书局当时为梁启超开的稿费待遇为千字三十元，而四川学者谢无量的待遇仅为千字四元，谢无量因此不平而辞职。参见吴虞丁巳一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281页。

⑪ 参见张元济1917年12月3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第287页。

难看出商务印书馆为了招揽章士钊所付出的代价。

因为向《甲寅》投稿与章士钊结下文字缘的胡适最初与商务并无多少联系，1918年初，已经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委托同事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推荐自己文章《庄子哲学浅释》。由于章士钊的说项，张元济决定发表该文，且按照之前与章士钊的约定从优给予胡适稿费千字六元，“此连空格在内”，共送五十元，胡适收到稿费后即回信表示感谢，“收到润资五十元”。^①此次交道大概是胡适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订交之始，此后胡适风头渐劲，开始让一直重视吸纳新学人才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和经理张元济对胡适青眼有加。

1919年4月初，坊间有胡适将离北大别走的传闻，让张元济开始有礼聘胡适进馆工作的打算，并计划为之开出最高薪月薪三百元。^②事情未成之后，1920年3月8日，张元济和高梦旦又特别为胡适做了变通，计划在北京设立商务印书馆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③商务印书馆同时给予梁启超的待遇亦是如此，^④由此可见，在商务印书馆看来，胡适的能力与影响力这时已经可以同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最有名的人物梁启超媲美了。

1921年7月，张元济、高梦旦又恳切邀请到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运营情况的胡适出任地位重要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为胡适婉拒，但胡适却又反对高梦旦聘用另外一与自己文化立场敌对的留学生刘经庶（伯明）代己，“决不可”。^⑤在胡适看来，商务印书馆太重要了，“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⑥“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⑦他自己由于之前同亚东图书馆的密切合作，加上商务所开出待遇也不如北京大学教授待遇，^⑧他又有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和写作的计划，“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不便就任，“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因此胡适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认可的人接手此职，所以胡适推荐了为商务印书馆不熟悉、且无多大知名度的王云五出任此职，张、高对王虽有疑虑——“他们大诧异，因为他们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意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⑨但也基本遂其所愿（王云五1922年1月1日正式接替高梦旦出掌编译所），双方后来建立了密切关系，胡适成为商务座上宾，深得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人信任，此后商务对胡适的各种要求与推荐基本都予以了满足。张元济甚至说只要胡适看中的书，可以随时开列名单推荐给商务，“不妨随时想得，随时开示，敝处出版，本无限制也”。^⑩为了同亚东图书馆竞争胡适这个招牌，商务印书馆不惜愿意贴钱资助胡适办《努力》月刊，甚至打算“无论什么条件都可遵依”（该刊后来因种种原因未办成）。^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胡适自己即开始帮商务印书馆招徕作者，如他听说周作人在翻译日人的小说集，就致信周作人希望他能将此书放到自己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世

① 参见张元济1918年2月2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第323页。

② 参见张元济1919年4月8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0页。据胡适1921年7—8月间所作调查，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机构的编译所成员一百六七十人，其中一百零八人月薪在五十元以下，百元以上的也才三十七人，而月薪为二百五十元以上者仅三人。参见胡适：《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519页。

③ 参见张元济1920年3月8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第192页。

④ 参见张元济1920年3月13日。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第194页。稍后（1920年4月10日）张元济致信梁启超表示商务愿意再追加二万元支持梁启超试办。参见张元济致梁启超函，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1页。

⑤ 胡适1921年7月18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367页。

⑥ 胡适1921年4月27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218页。

⑦ 胡适1921年8月13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416页。

⑧ 参见胡适：《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519页。

⑨ 胡适1921年9月6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446页；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9卷，第666—669页。关于胡适此次考察商务印书馆的情况，还可参见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7—122页。

⑩ 参见张元济：《致胡适（1923年9月8日）》，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37页。

⑪ 参见胡适1923年10月17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卷，第73页；胡适：《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第379—381页。

界丛书”中出版，因其不但排印错误少，且所给稿酬也高。^①周作人遂答应了胡适的邀约，后来将自己翻译自日人的《现代小说译丛》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胡适与商务这次合作办《努力》月刊的事情，友人高一涵对此还产生了误会，认为是商务在借此赚钱，“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而薄待学者”，^②遂在《晨报副刊》发文进行批评揭露。胡适读到高文后连续致信高一涵与《晨报》社进行调解沟通，为商务印书馆辩护。^③

短短三四年间，胡适已经由需要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的后辈后来居上，成为商务印书馆全力笼络交好的对象，双方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胡适离开中国大陆远赴美国（后来胡适与王云五主持的迁台的商务印书馆仍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④。而当初推荐胡适与商务结缘的章士钊早已瞠乎其后，两人在学术界、思想界地位的这种转换通过稍后胡适对章士钊杭州演讲内容公开表现出的答复即可管窥。1923年9月27日，潘力山、吴恒夫妇等人来看望尚在杭州的胡适，晚间旅馆中聊天时，潘力山告诉胡适章士钊（行严）要其转达给胡适的传话——“给适之出了一个题目”（指前引章士钊的杭州演讲挑战，引者注），胡适听闻后马上回复说：“请你告诉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他的文章不值得一驳。”胡适这里并要潘力山将“不值一驳”四个字转给章士钊。^⑤对私交好友章士钊的文章做出这样毫无顾忌的评价，胡适自信满满的一面暴露无遗。只是面对胡适对章士钊如此不客气的评价，身为章氏好友的潘力山并没有将其传达给章士钊。十天后胡适到上海，章士钊则特地到亚东图书馆与胡适“畅谈”。利用这次机会，胡适当面将其“不值一驳”的观点告诉了章士钊，章氏居然保持“雅量”，没有动怒，胡适遂在日记中评价章士钊道：“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 gentleman。”^⑥为了留存证据，胡适还特意在日记中留下章士钊这篇长章的剪报，将其置于他8月17日写成的白话诗后^⑦。

1925年2月初，章士钊在就餐时遇到人在上海的胡适，于是邀请胡适一起拍照，并题写了白话诗留念：“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面对章士钊的如此主动示好，胡适认为章士钊已经“豪爽的投降”。不过章士钊随后却在新复刊的《甲寅周刊》中连续批评起白话文了，内中当同样不乏借重胡适之名进行炒作之意。胡适决定撰文公开还击章士钊。在这篇俏皮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中，胡适将章士钊定位为“我手下这员降将”，为章士钊做结论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⑧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胡适成竹在胸、居高临下的姿态。

五、胡适与吴虞

当然，胡适的聪明和类似处世智慧绝不只是上面所及的几处，^⑨一些先前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揭示，这里再就各著未及的胡适与吴虞关系进行一点补充。众所周知，吴虞之出名乃是得力于《新青年》上发表的诸多反孔文章，赴北大任职前，吴虞与在北京的胡适并无深交。1920年初，当吴虞女儿吴桓（辟疆）得到同乡潘力山资助准备赴美留学时，需要京中“有名望者”充作保证人以保证学费“不至中途断绝”，胡

① 胡适：《致周作人（1921年8月30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第325页。

② 参见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80页。

③ 胡适：《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致〈晨报〉副刊（1924年9月9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第379—384页。

④ 1936年，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著名文字学学者杨树达个人论文集《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打算请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被拒绝，“托辞不肯印行”，杨树达“不得已”，“托北京大学某君言之”，此处的某君即杨树达内心对之颇为不满的胡适，杨书在胡适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才“允许出版”。参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⑤ 胡适1923年9月27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卷，第54—55页。

⑥ 胡适1923年10月8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卷，第65页。

⑦ 参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卷，第127页。

⑧ 参见胡适：《“老章又反叛了！”（1925年8月27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2卷，第73—78页。

⑨ 顾颉刚因时人将其与胡适比较认为他不够“活络”，为此感叹：“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实在比不上胡先生。书此志愧。”顾颉刚1921年1月11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87页。

适（1920年2月18日）就为之撰写了一中、一英两份保证书，鼓励吴桓去美国学文学，并答应吴桓愿意写信到美国“介绍他的先生和朋友，使桓到了的时候不至吃亏”，胡适同时借吴桓问候吴虞，表述“愿与大人通信，我非常佩服大人的”，此外，胡适还致信在美国的好友陈衡哲，“并他母校的先生等，请他们善待我”，还希望吴桓去拜会适在北京的杜威夫妇及其女儿。^①透过吴虞的记载，胡适希望同吴虞结交的主动性和热情度不难想见。故此，吴虞稍后（3月21日）致信胡适表示感谢：“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②不过胡适对吴虞的这封来信并没有立即回复，仅托人在北京法政大学任教的吴虞堂弟吴君毅转告吴虞收到此信，迟至9月初因吴桓与胡适友人潘力山结婚事出现风波才致信吴虞为两人进行解释。^③

1921年5月中旬吴虞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京后，他率先拜访了胡适，这次会面，吴虞在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据其称双方从北大人到学术，谈得很愉快，“谈极久”，面对初来乍到又赠送其一部亟需《费氏遗书》的吴虞，胡适在谈话中多有臧否北大同人之处，当吴虞问及胡适如何为学生讲国文时，兴高采烈中的胡适即言：“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总不足，捣乱总有余。”胡适对吴虞讲的这些话可谓交浅言深，颇能显示他少年得志与率性的一面。在谈话中胡适还向吴虞“申明”，“向不回看朋友”——此表态显然可见胡适之细心。^④吴虞当日日记中对于胡适的评价是：“其思想活泼，殆少其匹。”^⑤不过有心的吴虞随后也记下了另外一位朋友“文范卿”对胡适的评价：“目适之为市井学者，以其善识时投机也。”^⑥

其实，胡适对学养和经济能力均不足的吴虞女儿留学一事的支持（吴桓未去美国前即表示“往美后不再呼吸中国恶空气”，^⑦船赴美国途中即与有妇之夫的潘力山同居，上岸入境两人即于旧金山领事馆举行了正式婚礼，消息传到北京和成都后，引起风波。而吴到美国后英文能力不够，求学不成，加以资财不足遂回国，又与吴虞关系闹僵，后也同潘力山离婚，成为小报的消费对象），并非其本心所愿，因为胡适内心是反对一般人出洋留学的，大概是他考虑到出洋留学花费巨大，一般人支付不起，且留学效果不一定好的缘故。^⑧如此前胡适对来自湖南的崇拜者青年知识分子舒新城询问留学时的答复。1919年10月29日，甫从教会学校福湘离职的舒新城打算赴胡适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致信胡适请其指教：

我现在筹得有千块钱，想明年暑假赴美国去学教育。预算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但是那里的费用太大，不晓得有别的相当的学校吗？先生在美国多年，对于那边的情形很熟悉，请代为商量决定。^⑨

胡适给舒新城的复信已不可见，据舒新城自谓是胡适“不主张我到外国做半工半读的留学，劝我努力

① 吴虞 1920年2月24日、3月12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524—525、529页。

② 吴虞来函，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第330页。该函又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87—88页。

③ 吴虞 1920年5月15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539页；胡适：《致吴虞（1920年9月3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1—112页。

④ 钱穆回忆 1930年代在北京任教时，胡适之曾拜访过他一次：“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来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3年，第161页。

⑤ 吴虞 1921年5月13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胡适同日日记中也有吴虞来访一事的记录，但只记载了吴虞送其书和他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论。参见胡适 1921年5月13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7页。

⑥ 吴虞 1921年5月15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600页。后来胡适好友杨杏佛也公开批评胡适喜欢“投机”，讽刺他是“随环境而变迁的”“万应如意油”。参见杨杏佛：《对教育家、思想家的针砭》，《民国日报》1930年4月24日，第1张第4版。该文剪报也被胡适收入日记中，参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634—636页。关于胡适之善变，江勇振教授在研究中也多有揭示。

⑦ 吴虞 1920年1月19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516页。其实吴虞自己对其女儿吴桓也早有批评，认为吴桓“浮华不实，羡慕虚荣，封己自是之气逼人，盖兼下流社会之卑陋与虚骄二派而有之者”。参见吴虞 1919年8月20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480页。

⑧ 胡适 1929年5月12日日记曾列举了去英美留学的花费：“出洋留学者，来往旅费须二千元，每年须二千元（英美两国），三年须六千元，至少须八千元。”参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80页。

⑨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265—266页。

自修”。^①面对另外一个湖南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关于出国留学意义的问询时，胡适亦以自己之前《非留学篇》文章中的看法，认可毛泽东没有必要出洋留学的意见。^②另外据胡适日记记载，吴淞要塞司令邓镜寰曾与胡适谈起他想出洋留学法国事，胡适劝他不必出洋，“但以留学经费的一小部分买书，每日一课程读书，远胜于到外国上课了”。^③胡适这里还认为如果每年能购买五百元的书好好读，三年读一千五百元的好书，“远胜于留学三年了”。互相对比，胡适老于世故、随机应变的一面可见一斑。

六、结语

1923年底，年轻的学者支伟成（1899—1929）致信正在倡导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已经将胡适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与章太炎、梁启超并列了：“方今海内学者，端推先生及章、梁为大师。”^④之所以有如此认知，原因之一即支伟成之前同样误会胡适有家传汉学素养：“先生为汉学世家，故以考证训诂校勘为非难……”^⑤毫无疑问，胡适从时人这个错误的认知中获益良多，一如他1923年3月12日在致美国女友韦莲司信中的自夸：

在我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从小所受古典的教育。那些攻击我的保守学者，由于我在中国文学和哲学上的研究，已经渐渐的归向我们的营垒。^⑥

直到1925年底，在答复日本人桥川醉轩关于其出身的求证信中，胡适才去主动纠正众人对胡适朴学世家出身的错误认知：“说我是胡培翬之曾孙，此是近人的误说。我和胡培翬先生不是一家人，虽同县同姓，而没有血族上的戚谊……”^⑦有趣的是，恰在此前，胡适应已收到绩溪三胡后人胡晋接的求助信，他希望胡适帮忙将其先人胡秉虔的遗著从吴承仕（检斋）处购回。^⑧胡适给桥川的答复很可能是受到了胡晋接来信的影响，即便如此，胡适将致桥川信公开发表要到1927年了，此时胡适的名望早已如日中天。

抑有进者，为了强化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和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为了回应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足智多谋的胡适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不断撰写和追忆新文化运动史或白话文文学史、国语运动史、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之类的文本，以及诸多自传式、总结式的书写和看似客观的批评性文字或回应文章、有关讲演，为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运动进行历史定位，也为竞争对手如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及批评者“学衡派”、国民党等力量进行定位，借此塑造和强化了自己与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的先见之明与贡献，由此也遮蔽了胡适自己当初自信不足的事实，正当化了其自身早具有先见之明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形象，进而促成了胡适的偶像化。故此，当日他才会有在信中向女友韦莲司自夸他成为“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之一时的自满与矫情：“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功，我似乎是一觉醒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⑨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回国之后，胡适就不断遭到各种批评攻击。如《新青年》的一些读者及林纾等人批评他倡导白话文。在美国，一些留美学生讥讽胡适博士论文口述没有通过却以博士自居，为此好友朱经农还两次致信胡适要其辟谣并出版博士论文作为证明（这也说明胡适将自己未获博士学位一事也一直瞒着好友朱经农）。^⑩至于吴宓主持的《民心周报》和《学衡》两个杂志及章太炎主持的《华国》杂志，更是

①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273页。

② 参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部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③ 胡适1929年5月12日日记。参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80页。

④ 《支伟成致胡适（1923年12月10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326页。

⑤ 《支伟成致胡适（1922年1月10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第321页。

⑥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⑦ 参见《胡适致桥川醉轩函（1925年12月25日）》，此信未被收入季羨林主编之《胡适全集》，转见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18年，第22页。

⑧ 参见胡晋接：《致胡适（1925年11月25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3页。

⑨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45页。

⑩ 参见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9月7日、1920年8月9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7、110页。

不断批评新文化运动和胡适。之后胡适因去见废帝溥仪、反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及参加善后会议，又一度遭到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严厉抨击，至于其他各种各样对胡适的批评、责难更是不胜枚举。如胡适自谓：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①

可以看出，胡适之所以不断遭到批评，跟其极力倡导白话文与选择特立独行密切相连，更同其后来万众瞩目的偶像地位有紧密关系。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只是这些责骂的言论非但没有摧毁胡适的学界祭酒地位和偶像形象，反而表明了在当时人眼中胡适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提升了其人气与关注度，凸显了胡适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的炙手可热程度。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胡适偶像地位的形成亦同其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针对和衬托密不可分。就像 1927 年 4 月 10 日胡适在致女友韦莲司信中显示出的自负和自信：

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②

最能展现胡适这种骄傲心态的还是稍后新月书店为胡适《国语文学史》一书所做的广告词第一句：“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③ 这样一句话，将胡适在当时“学术江湖”中的地位与霸气彰显无疑。

总而言之，胡适之所以“暴得大名”，固然是建立在他自身的学养和能力（或者说天分与聪明）乃至他所处的北京大学位置基础上，但也同社会提供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流行的大氛围密切相关。这其中，少年老成的胡适有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尤其是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且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乐于提携如顾颉刚这样的后进，甚至不惜借重为陈独秀、钱玄同等不喜欢的宋春舫、张謇等人，“转为吾辈所用”，^④ 努力拓展人脉和扩大声望，这皆有助于有学有术的他迅速为人们接受。

有必要提醒的是，上文虽然较多谈及了胡适世故、聪明与好名、“善假于物”等所谓“不老实”的一面，但我们仍不能率而视胡适为一个“全用权数之奸雄”，或者认为胡适单纯就是依靠这些能力和手段就出人头地了。根本上，胡适仍是一个外圆内方有真性情的人物，且非常“爱惜羽毛”，喜欢不断反省、自我完善，控制自己不向“冷血”和“奸雄”那一面发展。如其在美留学时的反躬自省：

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数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⑤

看得出，胡适非常注意提高自我修养和抑制自己的“率性”，努力朝着“国人导师”和“圣人”那一面进化：“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人导师之预备”。^⑥ 同样，胡适也深刻意识到“暴得大名的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正直、谦和、理性等“作圣”的一面，^⑦ 而其公心、热心、细致、“硬骨头”与反省意识、批判精神也均

① 胡适：《致邵飘萍（1925）》，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398—399 页。

②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 168 页。

③ 转见胡适：《致钱玄同（1927 年 8 月 11 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456 页。胡适在信中自谓此广告语非其所撰，但从胡适为人做派来看，该信中的表达有些不打自招，此广告出自其手可能性非常大。

④ 参见胡适：《致钱玄同（约 1919 年 7—8 月间）》，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38 页。

⑤ 胡适 1914 年 6 月 8 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330 页。

⑥ 胡适 1915 年 5 月 28 日日记，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8 卷，第 148 页。

⑦ 参见罗志田：《“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2—262 页。

为不少时人激赏，朋友谑称其为“胡圣人”，实是其来有自。即便胡适偶有偏激、失言、自负和自满之处，也有傅斯年^①、丁文江^②这样一帮诤友、同道在帮助、劝说和提醒他。这均有助于胡适迅速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偶像变为之后引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要角。

与胡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成就大名的其他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即顾颉刚所谓的北大诸“新文化运动大家”，在五四之后“真实做事的”，除了蔡元培与胡适之外，几无他人，“大家看了虚名的可以招致外边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不做，专做文章去发表。所以北大在名望上很高，而里边的事务就腐败极了”。进而顾颉刚认为：“倘若现在不是新文化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恐怕现在的所谓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谋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够侍候颜色，狐媚巧佞了。”^③

一言以蔽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既是胡适自身刻意营造与表演的结果，也是其同侪衬托与论敌批评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追捧造星的结果。而受众对胡适形象塑造工程的积极参与，更是格外有意义，正是他们才使得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真正成为此后大家争相攀附的对象“我的朋友胡适之”。

（责任编辑：周奇）

Making the Idol of the New Culture: Hu Shi and His Readers

ZHANG Zhongmin

Abstract: Having gained fame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u Shi further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John Dewey's visit and quickly became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fields. After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the idolization of Hu Shi and the surrounding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reading, it can be found that Hu Shi's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tactic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He was adept in leveraging mass media as his vehicles and interacting with diverse readers, all of which paved for his rise to fame. In sum, the establishment of Hu Shi's status as a new cultural idol is a construct that involves both Hu's deliberate endeavor and performance and the public's active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u Shi, idol, the readers

① 初留学欧洲的傅斯年曾致信胡适，提醒其成名后的“更极危险”，“不可不预防”：“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归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傅斯年这里希望胡适“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只满足于“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参见傅斯年：《致胡适（1920年8月2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8页。

② 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文评论梁漱溟的著作，内中有“荒谬”“不通”等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表达，丁文江读到后即致信胡适进行提醒和劝告：“正式发表的东西，不可以有如此漫骂的口声。”参见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4月2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2页。

③ 参见顾颉刚：《致刘经庵（1922年6月19日）》，《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13—117页。